



本书是对开国三大运动之一的土地改革运动的全景纪实,第一次用纪实文学的手法来描述这一伟大运动。作品通过第一手资料,真实反映了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和血腥压迫,阐明了改革封建地主土地制度的迫切性和必要性。

开国大土改(节选)

作者:白希

中共党史出版社

群众又要杨朝达报劳动。杨朝达说他家有四个劳动力。群众问他什么叫劳动,他说天天出去累就叫劳动。结果招来群众一顿讥讽。

群众接着要杨朝达报成分,他说:“你们说我是什么成分,就是什么成分吧。”群众说:“要你自己说,自己承认!”杨朝达就说:“我是劳动地主。”

群众听了他的话,忍不住大笑,杨朝达自己也笑了。有人叫他别笑,他说:“笑都不许我笑。”

她家的地势比窗后的路高,差不多要高出一个人那么多。她站在窗子边,悄悄往外望,没看见他从厕所出来。但她往下一望,就一眼看见老三站在不远处,脸对着她家的窗子,她吓得蹲了下去,头碰在窗前的课桌上,撞得咚的一响。

她妈妈问:“怎么回事?”

她连连摆手叫她妈妈别说话,然后她就那样半蹲着,走到屋子前面她住的那边去了。她知道他眼力再好也不可能看到隔墙后面的她,才敢站起身,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

过了好一会,她才又悄悄走到窗口,往外看了一眼,他已经不在那里了。她不知道他刚才看见她没有,如果看见了,那他就知道她其实在偷偷看他了。她站在窗边看着窗外那条路,看了好一会,也没看见他,她想他可能走了。天都黑了,他会去哪里呢?

她回到自己住的那半间房,边织毛衣边胡思乱想。过了一会,有人在敲门,她以为是老三,心里紧张地思索该怎么对妈妈撒谎。

但等她开了门,却看见是学校钟书记

最后杨朝达只得承认自己是地主,但心里不服气。嘴里嘟囔着:“我生不逢时,没奈何,只好当地主了。”大家又追问他:“你真承认了吗?”

“承认!”
“真承认还是假承认?”

“真的。”
“你投降了吗?”
“我早就投降了呀!”

接着,儿童团又去斗杨朝达的老婆。儿童们说他们去检查的时候,揭开他家锅盖来看,见煮满

锅干饭,儿童们说:“我们贫困户吃的都是稀饭,你们不准吃干饭!”随即打瓢冷水泼去,杨妻因此便打骂他们。杨妻不承认错,大家便强迫她跪了下来。

紧接着又斗杨,有群众问他:“你隐藏得有武器没有?”他死不承认。大家气极了,邓旺、天福便将他捆了起来,要他坦白,他还是死不承认,并说:“没有!没有!杀了我也没有!”

这时村农会小组长荣福把杨成(本村农民)拉来作证,他还是

的小儿子,叫钟诚,手里提着个烧水的壶,看样子是到外面水管来打水的。钟诚对她说:“我姐姐叫你去一下。”

钟诚的姐姐叫钟萍,静秋平时跟她也有些接触,但不算走得很密的朋友。她不知道钟萍现在叫她去干什么,就问:“你姐找我干什么?”

“我不知道,她就叫我来叫你。快去吧。”

静秋跟在钟诚后面往外走,走到水管那里,她正想往右拐,去钟诚家去,但钟诚指着左面说:“那边有个人在找你。”

静秋一下子意识到是老三在找她,一定是他看见钟诚来水管打水,就叫钟诚去叫她出来的。她对钟诚说:“谢谢你了,你去打水吧,别对人讲。”

“知道。”

静秋走到老三跟前,问:“你……找我?”

他小声说:“想跟你说几句话,方便不方便?不方便就算了。”

她正想说话,就看见有人从厕所那边过来了,她怕人看见她在跟一个男的说话,会传得满城

故事发生在1975年前后那段贫穷而包含理想的时光:静秋是个漂亮的城里姑娘,因父亲是地主后代,家庭成分不好,文革时很受打击,静秋一直很自卑。静秋和一群学生去西村坪体验生活,住在村长家,认识了“老三”……

山楂树之恋(节选)

作者:艾米

江苏文艺出版社

风雨,拔脚就往学校后门方向走。她走了一段,弓下腰,装做系鞋带,往后望了一下,看见老三远远地跟着。她站起身,又往前走,他仍然远远地跟着。

她走出了校门,他也跟出了校门。他俩沿着学校院墙根走了一会,来到早上她捡球的地方,他跟了上来,想说话,她截断他,说:“这里人都认识我,我们到远点的地方再说吧。”说完,就又走起来。

他远远地跟着她,她一直沿着学校院墙走,从学校后面绕到

死不承认。最后荣福把从池塘里捞到的子弹拿出来给他看:“这是哪个的?你说!”这时他脸色大变,一下头低下去,身子都要倒了,连说:“我该死了!我该死了!是我的罪恶!是我的罪恶!”差点哭起来。

这个顽固狡赖的老滑地主,这才算被群众斗倒了。

四川省垫江县城西乡桂花村在评定成分时,地主的狡诈与顽抗也是十分突出的。特别是一些中、小地主,总是千方百计隐瞒土地面积和家庭财产,企图降低成分,逃避没收征收。恶霸地主李时雨在“清反减退”中被镇压后,其家属隐瞒土地,自报为富农。农民群众检举揭发了他家将土地契约秘密送给佃户等违法事实,经农会核实后,弄清了他家的全部土地面积,并按规定标准将其定为地主成分。地主周昌平,大量隐瞒家庭财产,装出一副早已破产的穷相,对此,桂花村农会采取了三条措施:一是清算其剥削帐、经济收支帐,二是发动知情的群众检举揭发,三是向其宣传有关政策规定,进行政治攻心,在无可抵赖的事实面前,周昌平只好取出了

藏在砖墙内的200多个银元,并交待了分散转移的大量衣物等财产,承认了自己的地主成分。

对于富农的评议,和地主有明显不同。富农也是在村农民大会上自报,内容也包括四个方面:报劳动,报雇工,报租人和租出土地,报剥削。对富农的评议不是采取斗争方式,而是采取批评的方式,使他们感到与地主不同。评议前,都要集合富农开会,进一步阐明对富农的待遇,以解除他们的思想顾虑。

对于中农、贫农、雇农等农民内部成分的评议,一般是在农民小组内部进行,采取自报公议的原则,以自报为主,公议为辅。其基本做法为:先由被评议者进行诉苦。有的地区提出了“诉苦团结自己”的口号。诉苦时,要求全家到场,一人诉苦,全家补充。接着进行自报,内容为:报土地,报财产,报受剥削情况。农民内部评议,比起对地主、富农的评议,相对来说要容易些。各地在评议中,都采取了一些有利于体现党的团结中农政策的作法。



我了。”他会心地一笑,跟着她继续往前走,问:“我们要去哪里?别走太远了,当心你妈妈找你。”

静秋说:“我知道前面江边有个亭子,亭子里有板凳可以坐一下。你不是有话要说吗?我们去那里说话。”

两个人到了那个亭子,里面空无一人,大概是天太冷了,没有谁会跑出来喝东南西北风。亭子就是几根柱子扛着个顶子,四面穿风,静秋找个柱子边的座位坐了,希望柱子多少可以挡一点风。

经济体,却完全受制于人,缺乏领导亚洲经济走出困境的起码魄力和胆识,不能不令处境绝望的东南亚国家心寒。最令人困惑的是新加坡的观点,让自己和自己的邻居拥有在惨遭劫掠的情况下相互帮助的起码权力,何以能产生“道德风险”?如此“有风险的道德”又是谁家的“道德”?

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是把危机的实质看得比较透彻的亚洲领导人,马哈蒂尔说:“我们并不知道他们的钱是从哪里来,也不知道到底是谁在进行交易,更不知道他们的背后还有谁。我们不知道他们在赚取金钱后是否有付税务;同时,这些税务又付给谁。我们同样不知道是谁在他们的背后。”他认为,在目前的货币交易制度下,没有人知道这些钱是否来自正当管道,或是有人在洗黑钱,“因为没有人可以过问,也无从查起”。只要这些人向任何一个国家发动攻势,那么不计其数的金钱就会涌向那个国家或进行抛售活动,任何人都抵挡不了。不论是货品市场、期货或证券交易,都是必须在正当

的体制下进行,“因此,我们必须管制货币交易,使之透明化”。马哈蒂尔随即遭到西方舆论界的全面围剿。马哈蒂尔尖刻的问题也许不太适合在外交场合发表,但他的的确确地回出了所有亚洲人心里的疑团。

另一个美国冷战时期的坚定伙伴韩国被金融风暴扫到之后,向美国伸出求援之手,不曾想美国的拒绝来的如此之快和如此的坚决。在国际银行家看来,与韩国的亲密关系已经成为冷战遗留的残骸。美国政府对于此事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和国家安全顾问的意见是应该伸手拉小兄弟一把,代表华尔街的财政部则坚决反对,甚至指斥奥尔布赖特不懂经济学。最后,克林顿服从了财政部的看法。

在财政部长鲁宾看来,这个危机正是撬开韩国经济大门的绝佳时机,他严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韩国施加比传统的苛刻条件更加严厉的措施来对待这个乞援的昔日盟友。

本书揭示了对金钱的角逐如何主导着西方历史的发展与国家财富的分配,通过再现统治世界的精英俱乐部在政治与经济领域不断掀起金融战役的手段与结果,本书旨在告诫人们警惕潜在的金融打击,为迎接一场“不流血”的战争做好准备。

货币战争(节选)

作者:宋鸿兵

中信出版社

本在援助一些受创的亚洲国家方面有所贡献,并将继续这么做,但把亚洲拉出经济泥沼并非它该扮演的角色。

新加坡副总理李显龙在谈到亚洲基金时认为,若为取代国际货币基金的作用,成立亚洲基金将有“道德风险”。

亚洲国家建立自己的基金即便在危难之中相互扶持原本是件天经地义的事,却极端不合情理地遭到伦敦-华尔街轴心的坚决反对,而日本作为区域内最大的

的新概念,那将是一个营救性机构,能以很快的速度,有计划地预先调动资金,援助那些受到国际投机者狙击的货币。当设立亚洲基金的建议在香港举行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年会上提出时,马上引起美国和西方国家的警惕,他们担心这将破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

最后,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只得表示,“我们不至于自大到认为我们有能力充当复苏亚太区(经济)的火车头”,他说,尽管日



费希尔说:“我们不认为设立一个提出不同条件的庞大基金或是长期机构,对此会有帮助。”

日本本来是亚洲基金积极的倡导者,但是迫于伦敦-华尔街的压力,不得不屈从,日本财政部长三冢博表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一贯在国际金融机构中发挥维护全球金融稳定的核心作用。亚洲国家建议组织的这个基金,将作为国际货币基金的一个辅助机构。”由东京设计的新概念将是一个没有资金的基金。根据东京